

# 二重社会网络及其分布的 中英比较\*

边燕杰 郝明松

**提要:**从社会网络观点看,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基于个体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网络。两种网络及其分布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异同如何?本文分析两种社会网络的中英差异,并用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而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低于英国。第二,两种社会网络的分布,中国比英国都更集中,与地位资源的相关性都更强。

**关键词:**社会网络 资源分布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 中英比较

社会网络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Granovetter, 1985; 科尔曼, 1999/1990; Putnam, 1995; 林南, 2005/2001)。本研究关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分布。于此,本文集中研究社会网络的两个相关问题:第一,基于个人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社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哪种联系更强、资源含量更高,为什么?第二,两种社会网络分布的跨文化、跨结构差异(费孝通, 1985; Bian & Ang, 1997; Pichler & Wallace, 2009; 边燕杰, 2010; 林南等, 2010)。我们选择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的中国与英国,借助两国具有公开的可比数据的便利,对二重社会网络——基于个人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社会网络——及其分布问题开展中英比较分析。

---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中英两国的比较研究”(科学部受理号:71010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部分研究活动也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和谐互动机制研究”的资助。初稿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2011年工作坊和2012年中英合作项目阶段性成果交流会上宣读。张顺、张磊、本刊编辑和匿名评审人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英国数据的处理得到合作方李姚军教授、孔建勳博士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 一、二重社会网络

社会学者关注人们的社会联系。因为只有通过社会联系,个人才能步入社会,认同社会,立足于社会。用社会学术语表达,这是一个从微观个体向宏观结构过渡的社会过程。反过来,从宏观结构到微观个体的社会过程也是借助于社会网络发生和实现的,因为社会对个体的文化陶冶和结构制约,正是通过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完成的。所以,分析社会网络的特征和分布,解释这些特征和分布的机理,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个体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本质上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个体与其他个体发生情义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亲朋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我们接受梁漱溟先生(梁漱溟,1986)的理论立场,用情义二字来概括亲朋关系的本质。情,就是说亲朋之间的联系没有工具性的前提条件,出于情感而建立关系。义,就是说亲朋之间的联系具有工具性的行为后果,相互之间恪守互惠义务。而互惠义务与情感的关系可有三种情态:一是互惠义务的满足强化了情感,关系被维持;二是互惠义务的松弛弱化了情感,关系被轻视;三是零互惠或负义务将伤害情感,关系被终止。情义联系不限于亲朋,同乡、同学、同事、邻居、战友等关系也可以发展成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情义联系。这些情义联系没有正式制度的约束,关系的建立、发展、终止都发生在个人层次,靠行为互动、文化理解、约定俗成,因为没有文字规定,所以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因此,以个体情义联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第二种形式是团体身份归属。除了家庭和亲属,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是通过参与某些团体并获得某种身份而实现的,例如学校、工作单位、教会、俱乐部、专业协会、兴趣团体<sup>①</sup>等等(科尔曼,1999/1990;Putnam,1995,2002;Li et al.,2005)。这些团体给予个人某种身份,如交通大学学生、“华为”职工、省政府干部、作家协会

<sup>①</sup> 在诸如英国那样的社会结构中,俱乐部、专业协会、兴趣团体等因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其相应的责、权、利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被视为正式团体。而在时下中国,这一类组织既有正式团体(如经民政部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专业协会),也有尚未获得制度承认和赋权的非正式团体。

会员,等等;这些均是一种结构化的标签,一种社会性的归属。在正式团体内部(如学校、工作单位等),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靠正式制度维持,团体的建立与运转也依赖于正式制度,所以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是正式社会网络。而在非正式团体中的成员关系及其运作,往往能够观察到既有正式社会网络的延伸,也有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编织,甚至两者相互嵌入而交互作用。

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就是本文所指的二重社会网络,这个区分具有重大的社会资本意义。我们知道,社会的有形物质资本(物品和财富)和无形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是属于自然人或法人所有的。我们同时知道,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流通起来,也就是说,在资本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人们将资本的使用权、收益权从A转移到B,比如物品借用、关系融资、权力威慑、亲朋间的知识交流和技能互补,等等。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社会资本现象:人们通过社会网络的运作而获得稀缺性物品、盈利性投资、创新性知识、增值性技能,从而达成工具性目标(Granovetter, 1973; 张宛丽, 1996; Bian, 1997; 边燕杰、丘海雄, 2000; Burt, 2000; Kijkuit & Ende, 2010; 林南、敖丹, 2010; 张顺、郭小弦, 2011)。换句话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经进入社会网络的流通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就是嵌入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而个体为了工具性目标动员了这些社会资源为己所用,进入目标导向的行动层次,社会资源就成为增值性的社会资本了。必须指出,社会资本的动员方式在非正式网络和正式网络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非正式网络中,动员方式基于关系双方的情感深浅、信任高低、互动多少,所以特殊性较强,排他性较大。而在正式网络中,动员方式基于个人的团体归属,按照他们与其团体的权责利合同关系分层共享团体资源,所以普遍性较强,排他性较小。

我们关心的是,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正式社会网络来动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来动员?对此,就要看二重社会网络在一个社会的比较分布状况和相对强势状况了。如果一个社会的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社会资源的主导流通方式将依靠团体身份归属,所以正式制度规范将较为有效地约束社会资本的动员和使用。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社会资源的主导流通方式将更多地依赖个体情义联系,所以非正式制度规范将较为有效地约束社会资本的动员和使用。二重社会网络的比较态势产生了费

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费孝通,1985)。

费孝通的“格局论”曾为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视角,也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证明(李沛良,1998;张文宏,2008a)。虽然最近西方研究开始考虑这两种格局与社会信任、经济环境、社会结构的关系(Li et al., 2005; Pichler & Wallace, 2009; Gesthuizen et al., 2011),但是鲜有研究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视角做系统比较。于此,我们提出二重社会网络的概念,尝试藉此从中、英比较的角度做出新的探索。应该说,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是任何社会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中国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而英国的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我们就对“格局论”具有了初步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基础。基于此,下文首先对中、英两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阐述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对社会网络分布的影响,进而提出理论假设,并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二、文化、结构与社会网络分布

### (一) 社会文化与网络分布

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直接关系到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生成。所谓文化,广义上指人类文明的所有形式,包括物质的和形式的形式;而狭义上仅指后者,称精神文化,主要包括信仰、价值、规范、意识形态等。精神文化必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上。这里所说的文化氛围就是指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乃至一个社会的综合的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并由此引发的主导的行为趋向。比如,同样遇到生计问题,中国人习惯性地找亲戚朋友帮忙,而英国人则很可能求助于政府及公益性组织。正是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影响人们建构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比如,某一个群体的成员强调人情、面子、报恩等,则这种交往互动有利于生成持久的私人化的情感互惠网络;反之,若在社会交往中强调利益、平等、规则等,则有利于建立正式的制度化的组织团体及其社会网络。

中、英社会的文化氛围有何不同?依据费孝通等的研究,从理论上

可将两国间的差异概括为关系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关系主义文化占主导,即文化氛围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强调、注重和认可伦理、人情、面子等行为要素;而这些要素都蕴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并在资源获取过程中以关系的性质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与中国不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占主导,即文化氛围强调利益、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公平性,强调团体组织的成员资格与身份归属,注重和认可蕴含在成员资格之中的权责利,习惯依照制度规范从正式渠道获取所需资源(梁漱溟,1986;费孝通,1985;Hwang,1987;金耀基,1992;Yang,1994;翟学伟,2004;边燕杰,2004a/2001,2010)。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更接近前者,而英国社会的文化环境更接近后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生活在中国,他的周围从一开始就会密布讲关系、论人情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不仅被潜在地要求注重关系和人情,甚至也被熏陶着学会讲关系、论人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日复一日,一个人的关系网络得以建立与扩展,放大了看,关系网络也得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与延续。同理,若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他所感受到的思想理念中,自我、独立、维权等等是司空见惯的,而资源的获得和运作往往通过组织机构和兴趣团体来完成(最常见的是宗教组织),无形之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与各种社会组织、兴趣团体打交道,习惯性地养成保护自我利益、遵守规则制度、维护客观公正的行为方式与理念。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以这样的理念行事时,正式社会网络的存在与发展就得以保障。故此,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为非正式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空间,而英国社会则为正式网络的建立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基于此,对于中、英社会网络的整体分布状况,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

假设2: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资源存量低于英国。

## (二) 社会结构与网络分布

除了文化氛围的影响,社会结构及制度环境在形塑社会网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孙立平,1996;刘晓辉、张璟,2006;阎云翔,2006;张文宏,2008b;李晗,2010;曾国权,2011;唐志军等,2012),而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考虑到社会网络的资源属性,我们重点分析一个社会的资源配

置结构。参照布劳(布劳,1991/1977)对社会结构的定义和格伦斯基(格伦斯基,2005/2001)对分层体系的理解,这里的资源配置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类型的资源在空间位置上的分布,以及社会资源流动的各种渠道与方式。下面具体分析中、英两国社会在此方面的差异及对网络分布的影响。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的主导特征是一元化。中国长期以来是“官本位”的社会,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各种资源的基础与核心,社会资源的分布与配置按照权力的大小、级别的高低排列与展开(孙孝良,1985;叶世强,1988;朱岚,2005),因此资源配置结构一元化其核心是权力主导化。当代社会是一元还是多元?市场转型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政治资本的收益越来越小,而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作用与收益越来越大(Nee,1989,1996)。这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由权力一元向形式多元的方向发展。但是,权力继续论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保证政治体制持续性的情况下进行的,权力的作用空间不但在体制内得以巩固,而且在体制外也得以扩大和增长(Bian & Logan,1996),没有受到明确界定与限制。同时,市场中存在广泛的“体制洞”与制度漏洞,因此权力拥有者通过调整与适应,使得权力不仅可以轻易扩展延伸到经济领域(Walder,1995;张五常,2000;Zhou,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并且也逐步显现出向知识领域的扩展与渗透(Li & Walder,2001;Bian et al.,2001;孙立平,2002b),从而使得社会的各种资源重新积聚(孙立平,2002a,2008)。综上所述,本文赞成后者,即中国社会的水平分化程度依然不高,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趋势仍然是以一元化为主导的。

英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多元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分布着相对独立、不同类型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边界与空间。相较于中国社会,英国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权力受得制约与制衡。英国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体制,不但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机构与机制对权力拥有者进行有效监督,而且通过维护和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选举权等(拓夫,1989;陈永鸿,2003),限定了权力的作用边界,使得“权力通吃”难以实现。其次,经济资源的作用空间也是相对有限的。工业革命之后,逐步建立起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活动成为政治权力之

外能够为资产所有者带来巨大收益的资源形态。但是,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规则,对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监督与管理;通过建立发达的社会福利、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开展宏观调控,规范了经济资源的动作空间,防止了经济力量的无限做大(周弘,2001)。最后,人力资源的作用增强。随着知识与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人力资源逐渐成为相对独立并为个人带来收益的重要资源形态(Schultz, 1959; Becker, 1964)。

资源配置的一元化结构与多元化结构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分布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是多元化资源配置结构,那么,人们拥有的某种特定资源形式不一定会导致其他资源形式的增加或减少(林南,2005/2001; 林南、敖丹,2010;张顺、郭小弦,2011;边燕杰等著,2012)。所以,在多元化的英国,社会网络资源的分布与其他资源分布的相关性不高。如果是一元化资源配置结构,那么,某种资源处于核心地位,它可以控制和转化为其他资源,而其他资源最终也会被核心资源结构所吸纳;因此,拥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财富、声望等,而拥有其他资源的人也会利用社会网络以进入到权力结构之中(Putnam, 1995, 2002; 科尔曼,1999/1990; Li et al., 2005; Pichler & Wallace, 2009; 翟学伟, 2011)。所以,相比于英国社会,在一元化的中国,社会网络资源的分布与其他资源的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藉此,对于社会网络在中英社会的结构性分布状况,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比于英国社会,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更集中,也就是说,人们的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与他们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更高。

假设4:相比于英国社会,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更集中,也就是说,人们的正式社会网络资源与他们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更高。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实证分析所使用的中国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调查总体是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18-69岁的城乡

居民。该调查采用分城乡多所段分层 PPS 抽样,通过入户问卷面访,最终进入本文分析样本为 9696 个。由于城乡样本数是事先确定的,非随机的,所以我们进行城乡加权,以保证分析样本的统计值反映全国总体的情况。英国数据是“英格兰闲暇、文化、体育参与调查(2007 - 08)”,调查总体是英格兰的所有居民,采用分层 PPS 抽样方法,通过入户问卷面访,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3040 个。由于英国抽样在每一阶段都是随机的,所以分析样本不需要地区比例加权。为了提高可比性,英国数据保留年龄 18 - 69 岁的被访者,筛选后的分析样本量为 10450 个。因有些变量(如收入、职业)出现缺失值,所以我们对中、英数据都做了综合加权,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 (二) 变量设计与样本描述

基于已有研究(Li et al., 2005),中英数据选取共同的自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居住地区、受教育程度、月工资收入、职业阶层。需要说明的是,受教育程度、月工资收入、职业阶层是检验假设 3、假设 4 的核心自变量,分别表示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阶层地位。这 3 个变量的操作化叙述如下。

受教育程度。这是人力资源变量,从高到低划分为 3 类:第一类包括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群体;第二类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中专群体;第三类为初中及以下和未受过任何正式教育的群体。中、英数据都是这样划分的。

月工资收入。这是经济资源变量。中国数据进行了直接测量,单位是元(人民币)。英国数据用年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出,单位是英镑。在回归模型中,为方便比较,我们按照四分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等 4 个收入阶层。这样处理避免了由于两种计算单位而产生的解释困境。

职业阶层。两国数据没有可比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变量,我们使用职业阶层来捕捉不同阶层的主导性资源的差异性,以检验关于阶层地位的研究假设。在认真对比中英数据给出的职业类别的描述之后,我们得到 8 个职业阶层,依次是:各类领导管理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个体经营者、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中国数据参考的是陆学艺的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陆学艺主编,2004),英国数据依据的是英国国家统计局职业阶层的

划分方法(NS-SEC)。<sup>①</sup> 在英国的数据中,被访者划分成十大类,前八大类和上述的中国数据的8个职业阶层一一对应;而对于“从未工作过的人”、“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由于中、英数据采用了不同的定义,不可做跨国比较,因此剔除。

表1列出了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于连续性变量,我们给出了均值和标准差;对于非连续性变量,我们给出类别的百分比分布。

表1 中、英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 量	中国	英国
分析样本量(份)	9696	10450
男性	46.76	49.87
18-29岁	17.14	22.81
30-44岁	41.12	33.51
45-59岁	30.16	28.95
60-69岁	11.58	14.72
平均健康状况(5点自评)	3.92(1.16)	4.07(.86)
未婚	8.99	23.09
已婚	86.09	65.97
离异及其他	4.92	10.94
城市居民	50.69	80.23
大专及以上学历	8.29	36.28
高中职高教育	21.21	21.50
初中及以下教育	70.50	42.23
平均月工资收入*	678.71(1199.20)	1789.86(1328.85)
各类领导管理者	2.39	4.60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89	6.87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3.49	23.83
办事人员	7.71	16.31
自雇/个体经营者	5.55	8.92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93	10.99
产业工人	17.18	15.70
农民/体力劳动者	47.86	12.77

注:\* 中国数据单位是元(人民币),英国数据单位是英镑。

①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ons.gov.uk/ons/index.html>。

由表1可见,中英数据在性别、年龄上的分布基本一致,但在其他方面则有较大差异:健康状况中国居民比英国差,平均得分低0.15;中国未婚及离异的比例都远低于英国,前者约低15%,后者约低6%;中国城市居民所占比例比英国低30%,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所占的比例比英国低28%。以形式工资来看,中国居民每月678.71元(人民币),英国1789.86英镑(英镑),以汇率10:1计算,英国收入水平是中国的26倍。最后在阶层构成方面,中国近乎是“倒丁字型”(李强,2005),底部3个阶层所占的比例达到78%;而英国是橄榄形,底部3个阶层只占39%。这些结构特征的中英差异提示我们,在检验研究假设时,必须将这些变量进入分析模型,然后再看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资源分布的影响程度。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分析

#### 1. 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

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基于情义联系的个人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研究领域提供了三种标准的测量方法,分别称为“定名法”、“定位法”、“资源法”,都曾在中国研究中被使用过(边燕杰主编,2011;边燕杰等著,2012)。但是英国数据没有相应的测量,只好放弃。在我们分析的中、英数据中有一项测量可供使用,就是被访者与亲戚朋友接触和联系的密切程度。这符合分析目标:与亲戚朋友接触和联系得越密切,相互感情和义务就越深、越广、越重,表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就越高。

中、英数据的这项测量并不完全等同。中国数据将亲戚和朋友放在一起进行测量,而英国数据将两项分开测量。在当代中国,虽然朋友的含义很广,但能和亲戚放在一起考虑的朋友是具有“亲情化”、“类亲属化”、“拟亲缘化”的亲密朋友(杨宜音,1995,张宛丽,1996,边燕杰,2004/2001,2010),而这种情形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绝少存在的(林南等,2010;边燕杰、张磊,2013)。为此,我们选择英国数据中“亲戚密切程度”,将其作为中国数据的“亲戚朋友密切程度”的可比变量来分析。两国数据都做5点测量,从“非常不密切”到“非常密切”依次赋值为1到5。

## 2. 整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基于这项数据,表2显示了频数、百分比、均值和标准差,然后对中英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表2的均值和标准差显示,中国居民与亲戚朋友的密切程度不但高于英国,而且集中程度也高于英国:中国趋向“密切”,而英国比较分散。总差异的统计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中国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支持假设1。

表2 非正式网络的整体分布

测 量	中国		英国	
	亲戚与朋友交往 (N = 9696)		亲戚交往 (N = 10438)	
非常不密切	63	.65%	308	2.95%
不密切	367	3.78%	1934	18.53%
一般	3116	32.14%	2099	20.11%
密切	5031	51.89%	3981	38.14%
非常密切	1119	11.54%	2116	20.27%
均值和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3.70	.746	3.54	.096
总差异	diff 值	.156	p 值	.000

## 3. 结构性分布的假设检验

交往密切程度是5点定序变量,偏态分布,为此选用定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杨菊花,2012)。将中英数据合并,以便计算国别差异系数,特别是国别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效应,从而检验结构性分布假设,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非正式网络的定序逻辑回归结果

变 量	基准模型	国别交互模型
男性(参照:女性)	-.215 *** (.030)	-.220 *** (.030)
18-29 年龄组(参照:60岁以上年龄组)	.399 *** (.058)	.383 *** (.058)
30-44 年龄组	.0441 (.045)	.076 * (.046)
45-59 年龄组	-.037 (.045)	.004 (.046)
健康状况	.099 *** (.014)	.101 *** (.014)

续表 3

变 量	基准模型	国别交互模型
已婚(参照:未婚)	.395 *** (.047)	.432 *** (.048)
离异及其他	.351 *** (.063)	.339 *** (.063)
城市居住(参照:农村居住)	-.047 (.037)	-.173 *** (.040)
大专及以上(参照:初中及以下)	-.558 *** (.047)	-.907 *** (.060)
高中职高	-.107 *** (.039)	-.317 *** (.062)
高收入(参照:低收入)	-.094 * (.051)	-.317 *** (.073)
中高收入	-.101 ** (.042)	-.155 *** (.060)
中低收入	-.094 ** (.041)	-.101 (.068)
职业阶层(参照:农民/体力劳动者)		
各类领导管理者	-.136 (.087)	-.252 ** (.126)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85 *** (.080)	-.542 *** (.115)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079 (.063)	-.043 (.085)
办事人员	.033 (.058)	-.093 (.084)
自雇/个体经营者	-.013 (.066)	.021 (.10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8 * (.055)	-.015 (.093)
产业工人	-.037 (.049)	.001 (.083)
国别(参照:英国)	-.188 *** (.035)	-.664 *** (.083)
国别 × 大专及以上		1.061 *** (.100)
国别 × 高中职高		.355 *** (.080)
国别 × 高收入		.419 *** (.100)
国别 × 中高收入		.199 ** (.084)
国别 × 中低收入		.132 (.086)
国别 × 各类领导管理者		.210 (.177)
国别 ×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59 ** (.164)
国别 ×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123 (.143)
国别 × 办事人员		.024 (.120)
国别 × 自雇/个体经营者		-.129 (.137)
国别 × 商业服务业人员		-.203 * (.117)
国别 × 产业工人		-.146 (.104)
阈值 1	-3.770 *** (.102)	-4.116 *** (.118)
阈值 2	-1.720 *** (.087)	-2.054 *** (.106)
阈值 3	-.172 ** (.086)	-.487 *** (.105)
阈值 4	1.973 *** (.087)	1.685 *** (.105)
样本量	17043	17043
Pseudo R - squared	.013	.020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先看国别交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男性与亲戚密切交往的发生率只有女性的 80.3% ( $e^{-0.220}$ ), 即女子与亲戚有 100 次密切交往, 而男子只交往 80 次。18-29 岁的年轻人的非正式密切交往大大地高于其他年龄组, 比 60 岁以上年龄组高 46.7% ( $e^{0.383} - 1$ )。人们自我健康评估越好, 与亲朋交往的密切程度越高。结婚扩大了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含量。农村居民的非正式交往发生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 前者是后者的 1.19 倍。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职业阶层 3 个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 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收入越高、阶层地位越高者, 其非正式交往互动越少。正是这些结构特征的作用, 当中国居民的这些结构特征与英国相同时, 中国的亲戚密切程度将低于英国(国别系数是负的)。这不是现状, 而是理论预测值, 未来发展趋势是否达到这一点, 静待实践的检验。

再看国别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国别与教育的互动项都是正的, 表明中国居民的教育程度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相关性要高于英国。国别与工资收入的互动变量系数随着收入的增高而增加, 说明越是高收入, 中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与其经济资源的相关性越是高于英国。最后, 阶层地位方面, 从总体上来看, 这二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如前, 即随着阶层地位的上升, 阶层地位与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的相关性, 中国高于英国。综合 3 个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 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的结构分布比英国集中, 其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更强, 表现出了更高的凝聚度, 支持假设 3。

## (二) 正式网络的具体分析

### 1. 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

正式社会网络基于人们的团体身份归属, 为此, 完善的测量应涵盖被访者的所有团体归属。受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人的影响, 西方学者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重视自主参加的兴趣团体、社会团体, 而不包括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参加的工作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数据只包括了下列五类兴趣团体活动: 健身体育、文艺娱乐、联谊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公益活动。虽然中国的工作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运作场域(边燕杰, 2004b; 边燕杰等著, 2012), 根据可比性原则, 我们在中国数据中也只好选择相同的五类兴趣团体活动作为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参与不同团体活动越多, 那么, 他/

她可能拥有团体身份就越多,从不同团体、组织、部门、领域所获取的内部信息、团体支持、组织资源就更具优势。基于此,我们加总上述五个方面,得出参与团体活动的总体状况,用以衡量一个人的正式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含量。

2. 整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表4给出了正式社会网络测量的描述性统计和中、英差异的比较、统计结果,其间各项统计值的计算方法与表2相同。由表4可见,60%多的中国城乡居民不参加任何自主兴趣团体活动,而英国不参与的只有1/4。参与兴趣团体活动中,中国比较分散,英国集中于1-3类。每人平均参加类别中国为0.86,英国为1.16,表明英国的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更高,统计检验显著,支持假设2。

表4 正式网络的整体分布

测 量	中国(N = 9696)		英国(N = 10450)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0类参与	5897	60.82%	2621	25.08%
1类参与	1499	15.46%	4122	39.44%
2类参与	910	9.39%	3102	29.68%
3类参与	670	6.91%	600	5.74%
4类参与	609	6.28%	5	.05%
5类参与	111	1.14%	0	0
均值与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86	1.306	1.16	.869
总差异	diff 值	-.304	p 值	.000

3. 结构性分布的假设检验

以参与五类活动的总得分为因变量,通过考察国别变量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效应的大小,来比较正式网络在两国间的结构性分布的差异。两国数据合并后,算出因变量的均值为1.036,标准差为1.141。经过实验比较,基准模型适合使用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而含有国别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项的模型适合采用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 model)(杨菊花,2012)。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正式网络的回归结果

变 量	基准模型	国别交互模型
男性(参照:女性)	-.035 ** (.016)	-.042 *** (.016)
18-29 年龄组(参照:60 岁以上年龄组)	.074 ** (.031)	.093 *** (.030)
30-44 年龄组	-.031 (.025)	.030 (.025)
45-59 年龄组	-.057 ** (.026)	.002 (.026)
健康状况	.041 *** (.008)	.044 *** (.008)
已婚(参照:未婚)	-.176 *** (.022)	-.147 *** (.022)
离异及其他	-.164 *** (.032)	-.163 *** (.031)
城市居住(参照:农村居住)	.376 *** (.023)	.168 *** (.023)
大专及以上(参照:初中及以下)	.322 *** (.023)	.214 *** (.028)
高中职高	.294 *** (.021)	.215 *** (.030)
高收入(参照:低收入)	.433 *** (.027)	.170 *** (.035)
中高收入	.274 *** (.024)	.132 *** (.029)
中低收入	.041 (.027)	.041 (.034)
职业阶层(参照:农民/体力劳动者)		
各类领导管理者	.595 *** (.045)	.160 *** (.059)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539 *** (.042)	.107 ** (.055)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565 *** (.036)	.128 *** (.042)
办事人员	.633 *** (.034)	.105 ** (.042)
自雇/个体经营者	.456 *** (.040)	.167 *** (.049)
商业服务业人员	.520 *** (.034)	.008 (.047)
产业工人	.519 *** (.031)	-.30 (.042)
国别(参照:英国)	.022 (.018)	-1.265 *** (.057)
国别 × 大专及以上		.290 *** (.046)
国别 × 高中职高		.093 ** (.041)
国别 × 高收入		.669 *** (.059)
国别 × 中高收入		.510 *** (.055)
国别 × 中低收入		.285 *** (.059)
国别 × 各类领导管理者		.818 *** (.088)
国别 ×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817 *** (.082)
国别 ×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901 *** (.072)
国别 × 办事人员		.869 *** (.066)
国别 × 自雇/个体经营		.307 *** (.081)
国别 × 商业服务业人员		.861 *** (.067)
国别 × 产业工人		.893 *** (.062)
Ln(alpha)	-3.449 *** (.347)	
常数	-1.076 *** (.050)	-.358 *** (.056)
样本量	17047	17047
Pseudo R - squared	.087	.117

先看国别交互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5 可见,男性在正式网络参与的得分显著低于女性,前者只有后者的 95.9% ( $e^{-0.042}$ )。越是年轻人越踊跃参与团体活动。健康状况对正式社团组织参与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未婚者更多地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城市居民的参与得分高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前者是后者的 1.18 倍。受教育程度、工资和职业阶层 3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总体上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工资越高、阶层越高者,其正式交往互动越多。

再看国别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国别与教育的交互项回归系数表明,中国居民高中中职高群体的团体参与程度比英国高 10%,大专及以上群体高 34%,这表明中国社会人力资源与正式互动网络的相关性更高。工资收入每上升一个层级,正式社团参与程度受经济资源的促进作用中国就越大于英国,表明中国社会经济资源与正式互动网络的相关性更高。最后,国别与阶层地位的系数都是正向的,统计显著,说明正式网络与阶层地位的关联性中国高于英国。综合这三方面的结果可知,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结构分布比英国更集中,特别是其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的相关性更强,表现出了更高的凝聚度,支持假设 4。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两类社会网络,即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在中国和英国的分布差异,目标是对费孝通先生的“格局论”尝试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比较。基于社会文化视角,即中国是关系主义占主导、而英国是个人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关系表达,由此推出关于社会网络的整体分布的差异比较。数据分析发现,非正式网络及其资源存量中国高于英国,而正式网络及其资源存量中国低于英国。基于结构视角,我们进一步发现,无论正式网络还是非正式网络,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度中国都高于英国。总体结论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共同影响着—个社会的网络资源分布,文化氛围为社会网络的生长提供了土壤,结构分化程度导致网络结构性分布的差异。

## (二) 讨论

上述各项结论是在相对有限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

首先,本研究对二重社会网络的测量,因为受制于现有数据,而不是为我们提出的理论“量身定做”的。所以,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在中、英之间不是等价的,中国的测量是“亲戚朋友”,而英国是“亲戚”。进一步确证本文的分析结果需要开展新的中国社会调查,对亲戚和朋友分别加以测量。而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也有瑕疵:工作组织作为最重要的团体组织没有进入测量之中,也有待新的调查数据来补充。在后续的研究中,特别是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设计更为适用的问卷,获取更可比的有效数据,以深化比较研究。

其次,非正式网络与正式网络的结构分布存在差异。由两个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相比于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的分布更加平均,与其他资源的相关性更弱,特别是与经济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很弱,且几乎都是一种负向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非正式网络主要基于情感联系,较少依赖于客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效应主要在于满足表达性需要,如思想的沟通、情感的交流,这一需要对于不同经济状况、不同阶层地位的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非正式网络的结构分布较为平衡。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最后,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其他视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思考。比如,本文虽然提出了二重社会网络,但是没有涉及这二者之间的关联与转换。换句话说,除了探讨二重社会网络的静态分布差异,也应探讨这二者在不同时空中的转化状况,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的演变开展动态分析。尤其在中国,工作组织是情义交换关系的重要生成场域,也是社会网络资源的重要动员场所。所以,同事关系如何转化为饱含情义的私人关系,而通过私人关系又如何运作工作组织场域的公共资源,应是十分重要的议题。深入细致地动态分析,将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二重社会网络的异同,了解社会网络的发展变迁,探索社会资本的运作规律。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2004a/2001,《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刘翠霞、林聚任译,《开放时代》第2期。  
——,2004b,《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学

学》第3期。

- ,2010,《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边燕杰主编,2011,《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边燕杰等著,2012,《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边燕杰、丘海雄,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王文彬、张磊、程诚,2012,《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文宏,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磊,2013,《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第1期。
- 布劳,1991/1977,《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胜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永鸿,2003,《英、美、日权力制约模式比较分析》,《理论月刊》第10期。
-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 格伦斯基,2005/2001,《社会不平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2版)》,王俊、刘能、张传良、王水雄、何慧丽、梁茂春、李国武、孙龙、胡杰言、杨渝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金耀基,1992,《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二十一世纪》8月号。
- 科尔曼,1999/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晗,2010,《分配制度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演变》,《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
- 李沛良,1998,《香港家庭的内核模式与差序关系》,马戎、周星主编《田野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 李强,2005,《“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梁漱溟,1986,《中国文化要义》,香港:正中出版社。
- 林南,2005/2001,《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南、敖丹,2010,《社会资本之长臂:日常交流获取工作信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林南、陈至柔、傅仰止,2010,《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效应——台湾、美国、中国大陆的三地比较》,《台湾社会学刊》第45期。
- 刘晓辉、张璟,2006,《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关系、关系异化与关系演进》,《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陆学艺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孙立平,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02a,《资源重新积聚——90年代中国社会分层基本背景》,《科学决策》第3期。
- ,2002b,《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第3期。
- ,2008,《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新远见》第11期。
- 孙效良,1985,《官本位制及其他》,《领导科学》第2期。
- 唐志军、谌莹、向国成,2012,《权力结构、关系型合约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拓夫,1989,《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世界历史》第3期。
- 阎云翔,2006,《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杨菊花,2012,《数据管理与模型分析:STATA 软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宜音,1995,《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叶世强,1988,《当议官本位制》,《社会》第9期。
- 曾国权,2011,《“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社会》第4期。
- 翟学伟,2004,《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11,《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顺、郭小弦,2011,《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第1期。
- 张文宏,2008a,《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的差序格局》,《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2008b,《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社会》第3期。
- 张宛丽,1996,《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弘,2001,《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朱岚,2005,《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理论学刊》第11期。
- Becker, Gary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Bian, Yanjie &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 Bian, Yanjie & Soon Ang 1997,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
- Bian, Yanjie, Xiaoling Shu & John R. Logan 2001,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79.
- Burt, Ronald S.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Gesthuizen, Maurice, Peer Scheepers, William van der Veld & Beate Völker 2011, “Structural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Tests for Cross-national Equivalence in Europe.” *Quality and Quantity* 10.
- Hwang, Kwang-kuo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 Kijkuit, Bob & Jan van den Ende 2010,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Colleagu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for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31.
- Li, Bobai & Andrew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6 – 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 Li, Yaojun, Andrew Pickles & Mike Savage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Trust in Brita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 Pichler, Florian & Claire Wallace 2009,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in Europe: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 (ed.) 2002,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Theodore W. 1959, "Investment in Man: An Economist's View." *Social Service Review* 33.
- Yang, Mayfair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宛丽

is negative. However, if Confucian culture is treated as an identity,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constitute a community with the same value. In this case, Confucian cultu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eralized trust. Besides, mediation test suggests that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enhancing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generalized trust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specific trust in “*zijiren*” (insiders), which means the trust in “*zijiren*” and the trust in “*wairen*” (outsiders) is not associated. This research corresponds to previous studies by Fukuyama and Redding, and our findings expand these classic studies.

Doctor-Patient Trust in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Society: A study on two villages in central China .....  
 ..... *Fang Lijie, Liang Xiaoyun & Jin Chenggang* 55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in two villages in central China,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rust logics in doctor-patient trust in rural society.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is personal trust, while their trust to doctors of township hospital is institutional trust.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villagers’ expectation for health service, the logic of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w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t the same time, both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shaped doctors’ behavior.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for the new medical reform is that to improve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village doctor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nhance their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villagers’ personal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should be fully used and strengthened to regulate and monitor village doctors’ behavior.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A China-Britain comparison  
 ..... *Bian Yanjie & Hao Mingsong* 78

**Abstract:** Individuals are connected to society throug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namely,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formal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people’s group identit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se two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issue by comparing cultural and social-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use relevant survey datasets to test several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hina is higher in the stock of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but lower in that of formal social networks than Britain; and (2) China’s distribution of both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is more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mo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status resources than Britain’s.